

中国哲学 文献选编

陈荣捷

编著

杨儒宾 吴有能
朱荣贵 万先法 译
黄俊杰 校阅

国学书库·哲学类丛

中国哲学文献选编

陈荣捷 编著

杨儒宾 吴有能 朱荣贵 万先法 译

黄俊杰 校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哲学文献选编/陈荣捷编著;杨儒宾等译.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5

(国学书库·哲学类丛)

ISBN 7-5343-7368-9

I. 中...

II. ①陈... ②杨...

III. 哲学—文献—汇编—中国

IV. 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8092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台湾巨流图书公司授权江苏教育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发行

出版者 **江苏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网 址 <http://www.1088.com.cn>

出版人 张胜勇

书 名 中国哲学文献选编

编 者 陈荣捷

译 者 杨儒宾 等

责任编辑 曹 军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厂 址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高岭村 电话 010-80366605

开 本 965×635 毫米 1/16

印 张 44.25 插页 2

字 数 580 000

版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5000

定 价 49.80 元

发行热线 010-88876731

编辑热线 010-88876730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自序

陈荣捷

本书起源,上溯40年代之初。其时查尔斯·摩尔(Charles Moore)与予同在夏威夷大学努力于东西文化沟通。以西人对于东方思想限于上古时期,可谓毫无进展,且每视东方思想为消极。如谓基督教之“爱人如己”为金律,而儒家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银律,而不知从来未有注家解作消极者。儒家由亲亲而仁民而爱物,孟子亦明谓与之聚之。我国经济破产、官僚贪污,打倒孔家店声浪日高,专事攻击其弱点,知识分子倾慕西方,谓西方之月亮亦比东方之月亮为光明。于是益增西方消极之观点。摩尔与予乃决定翻译东方思想全部,使读者可以观全。原定计划为一册,继以一册必在千页以上,难以印行,遂分印度、佛教、中国三本。印度部分由印度最著名学者 Sarve palli Radhakrishnan 与摩尔合编,1957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部出版,命题 *A Source Book in Indian Philosophy*;佛教部分,一时未找得相当人物,卒之流产;中国部分则由予担当。

1942年太平洋战争危急,夏威夷大学暂时停办。予转教于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当时美国大学尚未有中国历史哲学等课。即中国语言亦正萌芽。中国学者之访问美国著名大学一年起两年止者有之,而全时永远教授者,只夏威夷之李绍昌、巴蒙那学院(Pamona College)之陈受颐,与予三人而已。予既思把中国哲学全盘托出,乃分四大时期:一为先秦百家十三章,一为汉、魏、唐连佛教十三章,一为宋明理学九章,一为清代及现代八章。现代包括张东荪、熊十力与冯友兰,西方之得闻张东荪与熊十力之名者,此为第一次。又以西人译先秦典籍,并不参考注疏,有之亦一两家而已,如理雅各(James Legge)之翻“四书”全靠朱注。近人威利(Arthur Waley)极端反朱,转向汉注,然亦偏于一家。予乃参考多家。《老子》注三百以上,《庄子》注亦过百。予不敢谓全数看过,然参考不少,

注脚可以见之。就以《论语》而论,予不特参考汉之孔安国注与宋之朱熹《论语集注》,而亦参考清之刘宝楠《论语正义》。使读者得知各家注释,纷纭其说,与儒家思想之长期发展为何。书名必译,有词必释,引句必溯其源。所选材料,其中明引暗述,予欲一一探其源自,使读者得知我国思想之承前启后、今古一贯,其来自“十三经”者,因有索引,并无困难。若出于佛典与宋明著述,则引者或从段内抽出一二句或一二词,或且改换文句,只述其意。诚如海底捞针,无从入手。所幸一千引词,几已尽数查出,只十二则待查而已。节内又加评语,指出该段之特殊意义与对于中国思想之影响,每节加以号码。而于若干章首编备目次,以便检查,译全书者四种,译全文者三十七篇,其他选语亦以保全其面貌为准。编译之中,忙于教学与到处为抗战建国之演讲。或作或辍,卒之十余二十年之后,乃成此书。

书既成,亦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部于1963年取名 *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 印行,凡856页。如是巨册,非津贴不可。幸得四基金会支持,进行无碍。出版一年之内,书评达三四十。大多从外表上赞扬数句。香港 *Eastern Horizon* 杂志长篇介绍,则誉为奇书(amazing work)。书名概译《中国哲学诸源》,然书评者直译为《中国哲学资料书》。今用《中国哲学文献选编》,亦与原题相合。评家所指出错印误译之处,第二版均已改正,大致无误。《朱子选语》,原用《朱子全书》,因《朱子语类》当时遍寻不获。现则中日版本通行,故改用《语类》卷页。《朱子选语》147条之中,除两条外,皆已查得出处。1973年发现马王堆《老子帛书》,德篇在上,道篇在下,然此于《老子》之义无关。熊十力死后遗文出现多篇,皆于其根本理论之见于《原儒》与《新唯识论》并无更动。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新编》,现出至第六册,此乃其《中国哲学史》之新论,而其本人哲学,仍依《新理学》无异也。若谓时势虽然变迁,而此书仍保全中哲之本来面目,不为过也。

此书出版以来已二十九年。通常哲学之书,十余年内即已另为一书出而代之。而此书独当一面如是之久,亦时势使然耳。所谓时势,一者近年美国高等学府特重基本课程,因而东方哲学亦在选修之列;二者我国学人在美之治哲学者,忙于专著,无暇撰作儒释道并重而由古及今之书;三者最为重要,即朱子学之盛行是也。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明代思想盛行,盖因日本禅学流行美国,而王阳明心学与禅相近之故。80年代则朱学为

盛。1981 年有杭州理学会议,分朱熹、王阳明两组。1982 年予在夏威夷举办第一次国际朱熹会议。接着 1987 年有厦门之第二次国际朱熹会议。1990 年又有福建武夷山之第三次国际朱熹会议。近年来美国专书与朱子直接间接有关者已近十种,大学专研朱子者亦有数组。其他博士论文、志刊论文,与会议献文,数亦可观。朱学之兴,既可以改正王学之欠缺,亦可以开清代考据之学,此近三四年清代考据之所以在美崭露头角也。朱子不特集宋学之大成,而亦集中哲全部之大成,故凡研究朱子者,不得不用此资料书。

黄俊杰博士领导学者数人,翻译此书。因儒释道古今文体差异之故,由专家分工合作。书将成,邀予作序,欣然为之如此。

陈荣捷先生的学问与志业

黄俊杰

一

陈荣捷先生是当代学术界中国哲学研究的巨擘，望重士林，数十年来在海外从事中国哲学教学研究，作育英才无数，中英文论著每有刊布，必纸贵洛阳，为学界所传颂。今年（1991）正值先生九十大寿，敬撰此文以为先生寿。

先生于1901年8月18日（清光绪二十七年辛丑七月初五日寅时），生于广东省开平县三江乡南溟里，五岁入南溟里私塾，读《三字经》、《千字文》。尊翁斗南公于1881年赴美，先后在俄亥俄州的Ravenna与Akron创设洗衣馆，每四年返国探亲。1916年，先生年十五，赴香港，入拔萃书院（Diocesan School），是年九月，赴广州岭南学堂（Canton Christian College，1927年以后改称岭南大学）入小学七年级。1919年，五四学生运动如火如荼展开，先生亦参加学生运动，并在1920年代表岭南学堂，参加广州学生联合会，获选为部长，领导游行。1924年，先生自岭南大学毕业，时年二十三。1924年，入哈佛大学，翌年入哲学系，主修美学及西洋哲学，1928年，先生年二十七岁，于是年九月一日与李蕙馨女士结婚。次年（1929），先生以《庄子哲学》（*The Philosophy of Chuang Tzu*）为题，撰写论文，荣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夫人亦同时毕业于新英伦音乐学院，伉俪道经欧洲返国，是年九月先生出任岭南大学哲学教授，次年起，并出任岭南大学教务长。

1935年，先生年三十四。是年九月先生应美国夏威夷大学之聘，前

往讲授中国哲学一年,期满改任专任教授,并于1939年与哲学界知名人士共创“东西哲学家会议”(East - West Philosophers' Conference),至1989年共举办六次。先生在夏威夷任教至1942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夏大暂时停办为止。

1943年起,先生应美东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之聘,出任中国文化哲学讲座,教学之余,勤于著作。自1947年起,先生曾前后七次(1947、1949、1959、1960、1961、1962、1964)重返夏威夷大学暑期教学。1948年,先生与中国另一教授荣获Guggenheim奖学金,是为中国学者在美国得此著名奖金之始。次年(1949)应“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之邀,巡回美国各著名学府,讲授中国宗教与历史,强调中国宗教应分民间宗教与文人宗教两层次,文人宗教举冯友兰、熊十力等人为例,西方之提及熊十力者,此为第一次。1951年达特茅斯学院指派先生为文科主任,此为当时中国学人在美国学府行政之最高级者。从1960年开始,先生应《大英百科全书》编委会之邀,撰写中国哲学相关之论文。除《大英百科全书》之外,其他各种百科全书之中国哲学论文,亦多出自先生手笔,诚属殊荣。

1961年,先生欣逢六十花甲之庆,溯自1935年起初掌教夏大迄今已二十有六载矣。先生自是年起,开始勤译中国哲学典籍,所译《传习录》(*Instructions for Practical Living*)、《老子》(*The Way of Lao Tzu*)、《六祖坛经》(*The Platform Scripture*)、《中国哲学文献选编》(*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近思录》(*Reflections on Things at Hand*)、《北溪字义》(*Neo - Confucian Terms Explained*)等书,先后出版。1963年荣获四种奖学金,著述译书四种同时出版,士林引为美谈。1966年循例由达特茅斯学院退休,改任彻谈学院(Chatham College)Gillespie讲座教授,积极参加学术会议,指导后学,游历各国。是年应哲学百科全书之聘为中国哲学主编。先生以中国哲学已占得世界地位,乃请留美中国学者多人供稿。自1975年始以迄于今,兼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讲授宋明理学。1980年被选为亚洲及比较哲学学会(Society for Asian and Comparative Philosophy)会长,任期两年。197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82年,先生以一人之力,召开“国际朱子学会议”于夏威夷大学,并出版《朱学论集》、《朱子门人》等书。1990年,“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成立,先生应邀出任咨询委员,1991年“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总会”成立,以先生等三

人为副会长。(以上关于先生部分生平资料,参考陈澄之辑:《广东开平陈荣捷先生年谱》,收入陈荣捷:《王阳明与禅》,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4。)

二

从上文所介绍先生生平事迹可见,先生自少年时代立志为学,毕生皆坚守中国哲学岗位,著述宏富,英译中国哲学典籍八种、英文论著四种、中文论著七种,其余中、英、日文论文 138 篇。先生治学方面甚广,尤以宋明儒学研究成果最为丰硕,朱子学研究尤为权威。在这篇短文中,我无法一一介绍先生的著作,谨就个人平日诵读先生著作之余所获启发,就广度与深度两方面报告个人的一点体认。

首先,从先生著作的广度来看,先生论著的广度可于以下二端见之:一是综合性的眼光与历史的视野,二是对日韩相关资料之熟稔。由于眼光宏阔,先生每能于历史脉络中评估思想之发展,最能见其大;由于对日韩资料之运用得心应手,所以先生常能将儒学置于广袤的东亚思想史背景中衡量,而不仅囿于个别概念之解析。先生手著《朱学论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2)及 *Chu Hsi: Life and Thought*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7) 等二书,足以说明先生论述之广度。例如先生所撰《朱熹集新儒学之大成》(收入《朱学论集》第一篇及 *Chu Hsi: Life and Thought* 第四章)这篇论文,纵论朱子对新儒学之发展与完成、新儒学道统之建立,以及《四书》之转成,使朱子在儒学史上之地位彰显无遗。近数十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关于朱子学之论著如雨后春笋,不计其数,但咸以先生这篇论文为典范,盖以其论述之广度有以致之。先生在 1980 年“中央研究院”所举办的第一届国际汉学会议,发表《朱门之特色及其意义》论文,这篇论文广泛引用日韩关于朱子之史料,发现前此各书所未言及之朱子门人四十三人,这篇论文和先生手著《朱子门人》这部书很能展现先生对第一手资料搜集之广泛与运用之纯熟。

其次,再从先生著作的深度来看,先生治学特以考据见长,有疑必问,无献不征,故虽自成一家之言,然论断皆本乎扎实之资料,诚所谓“充实而有光辉”者也。尤有进者,先生凡有论述,皆能深入该论题之各个面向,穷尽存世之相关资料,故发而为文,即属定论。我们可以举先生的《朱子固

穷》及《朱子之宗教实践》二文,以说明先生学问之深度。先生探索朱子的宗教生活,不仅运用习见之《朱子文集》、《语类》、《四书章句集注》等书,更深入地方志(如《崇安县志》)及佛教文献(如《已大藏经》),抉发幽微,证明朱子之宗教信仰。先生又从《文集》及《语类》的大量史料中,旁搜密察,从朱子的家世、奉祠、俸禄、穷困、印务、受与等方面,证明朱子生活之穷困。就先生对史料搜集之勤谨言,可以“罗掘殆尽”四字形容。先生学问之深度,亦于此展现无遗。

三

先生毕生在海外弘扬儒学,数十年如一日,对中国文化研究在北美之发展,厥功至伟。我曾为先生编著之《中国哲学文献选编》中文版撰写“出版前言”,将先生毕生的学术事业分为四个阶段:(1)介绍中国思想时期(1935—1962);(2)翻译中国经典时期(1962—1972);(3)讨论中国哲学范畴时期(1972—1982);(4)推展朱子学研究时期(1982迄今)。其中以第四个时期最为重要,先生的重要著作都在这个时期发表。先生不仅将他毕生研究朱子学的著作陆续刊印,嘉惠学林,而且也领袖群伦,大力推动朱子学研究,对近十余年来,朱子学之成为显学,贡献至巨。1982年7月,先生在夏威夷召开“国际朱子学会议”,曾赋诗云:

朱学大成皆所宗,鸢飞鱼跃又徂东。

中西日韩天国会*,恍如梦里坐春风。(*夏威夷有天堂之称)

在先生的长期领导之下,朱子学已在国际学坛蔚为大宗,而先生的学问与风格更是光风霁月,使受教者皆如沐春风。谨敬录这首诗,作为对先生的学问与志业的总结。

出版前言

黄俊杰

一

《中国哲学文献选编》这部书,是陈荣捷先生以数十年功力,就中国哲学典籍加以选择并作论述的著作。这部书的英文初版原名是 *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于 1963 年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行,出版以来,纸贵洛阳,风行海内外,允为关于中国思想研究之取材最均衡、论断最审慎的资料选集。现在,这部书的中文版终于出版,上距英文原版问世之日,业已二十有九年矣。乘中文版付梓之便,荣捷前辈指示我就这部书的意义,以及中文本的翻译及注解工作,作一报告。长者之命,未敢重违,谨就管见所及略作说明。

二

首先,我想说明的是,这部书英文版问世二十九年来,一直是欧美各国高等学府讲授“中国哲学”或“中国思想史”等相关课程的必要教科书或参考书,其地位一直屹立不摇。这部书之所以无可取代,据陈先生自己的分析,是由于以下三个因素所造成的。

此书出版以来已二十九年。通常哲学之书,十余年内即已另为一书出而代之。而此书独当一面如是之久,亦时势使然耳。所谓时势,一者近年美国高等学府特重基本课程,因而东方哲学亦在选修之

列；二者我国学人在美之治哲学者，忙于专著，无暇撰作儒释道并重而由古及今之书；三者最为重要，即朱子学之盛行是也。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明代思想盛行，盖因日本禅学流行美国，而王阳明心学与禅相近之故。80年代则朱学为盛。1981年有杭州理学会会议，分朱熹、王阳明两组。1982年予在夏威夷举办第一次国际朱熹会议。接着1987年有厦门之第二次国际朱熹会议。1990年又有福建武夷山之第三次国际朱熹会议。近年来美国专书与朱子直接间接有关者已近十种，大学专研朱子者亦有数组。其他博士论文、志刊论文，与会议献文，数亦可观。朱学之兴，既可以改正王学之欠缺，亦可以开清代考据之学，此近三四年清代考据之所以在美崭露头角也。朱子不特集宋学之大成，而亦集中哲全部之大成。故凡研究朱子者，不得不用此资料书。（见陈先生为本书中文版所写的序）

陈先生在以上这一段自述中指出，这部书之所以风行一时，主要是由于：（1）美国高等学府对通识教育的重视，使中国哲学亦同列选修课程；（2）哲学界群趋专精研究，较少通论性作品可资参考；（3）朱子学之盛行。陈先生谦冲为怀，他所说的这三个现象都是这部书得以风行学界的外在背景。其实，真正使这部书得以为学坛所共尊，乃由于陈先生取材严谨、注解精审，不仅在译事上已臻于严又陵所说的“信”、“达”、“雅”等译事最高境界；而且，在思想内容上，也为读者提示了最为平衡的资讯与解释。

那么，陈先生是根据何种原则，来进行中国哲学资料的选载与英译工作呢？让我再引用陈先生“夫子自道”之言，来进一步加以说明。1984年12月，新竹的“国立清华大学”主办“中国思想史国际研讨会”，陈先生应邀发表主题演讲，题为《海外讲授中国哲学五十年》（Fifty Years of Chinese Philosophy Abroad）。在这次演讲中，陈先生回顾他五十年来在海外弘扬中国学问的事业，并特别以《中国哲学文献选编》这部书为例，指出他编撰这部书英文版时，遵循以下七项原则：

1. 尽量参读各种经典注疏；
2. 所有的中国哲学名词必须加以解释；
3. 所有的专有名词诸如“五常”等，都必须详举其内容；
4. 所有的引用书籍或论文，均译其意涵为英文；

5. 所有的地名或人名,均加考证或说明;
6. 所有原典之引文,尽量追溯其出处;
7. 对经典中若干重要的章句,均指出它在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性。

(以上参看:Wing-tsit Chan,“Fifty Years of Chinese Philosophy A-broad,”*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 S. X VII, Nos. 1&2, Dec., 1985, pp. 1-15)

今日我们通读陈先生这部书的英文原版,我们可以发现陈先生确实严守他自己提出的译事七戒。他英译《近思录》(Wing-tsit Chan tr. with notes, *Reflections on Things at Hand: The Neo-Confucian Anthology Compiled by Chu Hsi and Lu Tsu-Ch'ie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传习录》(Wing-tsit Chan tr. with notes, *Instructions for Practical Living and Other Neo-Confucian Writing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以及陈淳(1159—1223)的《北溪字义》(Wing-tsit Chan tr. *Neo-Confucian Terms Explaine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各书,均保持一贯严肃的工作态度。记得1984年寒假期间,我在日本东京查阅研究资料,即奉陈先生来函指示,代他赴东京的国立古文书馆,核对1553年朝鲜刊本的《北溪字义》,以便与永嘉刊本及其他刊本对勘。陈先生并在他的书中注明这件事(见:*Neo-Confucian Terms Explained*, p. 240)。陈先生治学一丝不苟、有疑必问的态度,使我发自内心真诚敬仰。

现在我想从两个角度来说明陈先生这部《中国哲学文献选编》的学术史意义。首先,从陈先生个人的治学历程来看,初版刊印于1963年的这部巨著,标示着陈先生学问的第二个阶段。诚如陈先生1985年在“清华大学”的主题演讲中所说,他在海外弘扬中国哲学的历程,可以分成四个时期:(1)介绍中国思想时期(1935—1962):陈先生从1935年秋间应聘夏威夷大学讲中国哲学,并在1939年与哲学界友人共议筹办“东西哲学家会议”(East-West Philosophers' Conference),1940年起兼任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系主任两年。1942年出任美国东部常春藤盟校之一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中国文化与哲学教授,并时时赴北美各大学发表演讲,介绍中国思想。在这个时期,北美各大学之讲授中国哲学或思想者寥若晨星,陈先生是当时少数的拓荒者之一。(2)翻译中国经典时期

(1962—1972): 从 1962 年以降, 陈先生积多年中国哲学教学经验, 深感西方学人对中国哲学之误解, 泰半由于语文隔阂而未能直接研读原典, 先生乃开始勤译中国哲学典籍, 英译《传习录》、《老子》、《六祖坛经》以及本书, 均先后在 1963 年出版。(3) 讨论中国哲学范畴时期 (1972—1982): 从 1972 年开始, 陈先生参与纽约州教育厅中国哲学宗教计划, 编大学教材, 至 1977 年止。是年六月, 出席夏威夷大学哲学系召开之“王阳明学国际比较讨论会”, 提出《湛若水对于王阳明之影响》论文, 发表于《东西哲学》会议论文专号。1973 年 7 月先生赴巴黎参加“世界东方学专家会议”(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 宣读《朱子对老子之评价》论文。这一年陈先生并兼匹兹堡大学访问教授, 讲授宋明理学。1974 年, 先生与各大学同人约四十八人创立“美国宗教学会”(American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Religion)。是年六月, 先生出席“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在檀香山召开, 而由狄培瑞教授(William Theodore de Bary)主办之“中日儒家实学思想国际会议”, 担任主席与评议员。1975 年 3 月, 先生应“比较文化研究国际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ivilizations)延请, 为是年年会之“荣誉讲员”(honorary speaker), 讲《中国三教合一之哲学意义》, 论文刊印于该会会刊。是年九月, 先生回任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思想访问教授, 与狄培瑞教授共同讲授理学, 以至于今。此后四年并兼任“美国东部理学研究组”(Regional Seminar on Neo-Confucianism)主席。1976 年 8 月参加 Benjamin I. Schwartz 与 Henry Rosemont 两教授在哈佛大学举行之“中国先秦哲学研究小组”, 发表论文《马王堆出现之〈老子〉》。十月先生被选为“比较文化研究国际学会”名誉会员, 并出席该学会在耶鲁大学举行之“中西文化沟通讨论会”。1977 年 6 月, 先生在加州出席由“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资助, 杜维明教授召集之“清代思想国际会议”, 发表论文《18 世纪之理学与戴震之哲学》。此后先生一直活跃于中国哲学界, 发表论文无数, 多数论题均与中国哲学范畴有关。(4) 推展朱子学研究时期 (1982 年迄今): 1982 年 7 月, 陈先生筹办“国际朱子学会议”于檀香山, 集合世界朱子学权威及对朱子有特殊研究之专家与青年学者八十人, 讨论十日。“纷纷海外说儒宗, 檀岛初会会西东”(李泽厚先生在会议期间赋诗), 诚为学界之盛事。这项会议的经费由檀香山商界领袖程庆和博士提供, 会议则由夏威夷大学与“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共同召开。会务由先生总其成, 会议论文集亦由先生主编, 书名是: *Chu Hsi*

and Neo-Confucianism ed., Wing-tsit Cha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6)。从1982年迄今十年间,先生领袖群伦,推展朱子学研究不遗余力。(以上所述,参考前引陈先生手著,“Fifty Years of Chinese Philosophy Abroad”;陈广湘辑,《广东开平陈荣捷先生年谱》,收入陈荣捷:《王阳明与禅》,219~242页,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4。)

这一段时期,可以说是陈先生毕生事业的高峰,先生关于朱子学的重要论著,如《朱子门人》(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2)、《朱学论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2)、《朱子新探索》(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8),以及 *Chu Hsi: Life and Thought*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7) 等书,均发表于这个时期。1977年陈先生76岁时,曾回顾他提倡新儒学研究的艰辛历程,诗曰:“二十载孤鸣沙漠中,谁知理学忽然红?异国恩荣固可重,故乡苦乐很难同。”这首诗是对他的晚年心境最深刻的描写,最后一句更是充满故园情怀。

《中国哲学文献选编》这部书,就是以上所述陈先生学术历程中,第二个时期最重要的著作,也是先生精研深思、用力甚深的一部译著。

其次,我们再从欧美汉学发展史来考量这部书的价值。

我在另一论文中,曾指出欧美学术界对中国学问的研究,大概可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涵盖16世纪到18世纪,大约三百年时间,是以天主教传教士的报道,尤其是耶稣会士的努力为主。大致来说,16、17世纪的耶稣会士认为中国是一个具有强大力量的理性文明,政治制度完善、妇女地位高,不过并非毫无缺点;有人指出中国人迷信、纵欲、科学知识落后等现象。而另外一批商人,尤其是荷兰人的报道,则认为中国人乃邪恶、无耻的化身。16世纪后半叶爆发传教士内部的礼仪之争,使得中西之间的文化交流受到阻碍。但是,在另一方面,在欧洲也引发了想去了解中国的强烈动机,尤其是中国的语言文字及古代历史,当然这与当时想建立世界语与世界一源论的基督宗教立场有关。同时,也由于礼仪之争引起欧洲人对于中国人到底是无神论者或是自然神论者的辩论。

在18世纪欧洲艺术中,“中国风”的庭园、装饰、器具、建筑也成为欧洲人欣赏、模仿的对象。“重农学派”以及“百科全书派”的学者们,都以中国为模范来鼓吹他们的理想。可是,由于耶稣会士逐渐在世界各地遭到敌视,以及欧洲兴起对“理性主义”与“古典主义”的批判,西方对中国产生了幻灭感,他们不再把中国看做理性、政府贤能及人民幸福的国度。

18 世纪后期的学者如亚当·斯密及马尔萨斯等人,都把中国看做静止而不进步,有相当多黑暗面的国家。前此,启蒙运动诸人虽也强调中华文明的静止性格,但只是想在世界理性的普遍化过程中赋予一个位置而已,并无贬斥之意。19 世纪初期黑格尔是集 18 世纪末对中国观感之大成的,他细读耶稣会士及商人、新教教士两方面截然不同的报道,在他世界历史的大体系中,中国仍落后在“自由之体现”的起步阶段,专制之君主是中国境内唯一自由的个人。

第二个时期是 19 世纪。从 19 世纪开始,耶稣会士重新来华,继续提供第一手资料供人研究中国,新教教士也开始进入内地传教,许多人并从事写作。字典的编纂、中国经典的翻译(包括儒家与非儒家的作品)、文学作品的介绍于西方,都是这个时期的重要贡献。在欧洲的学术机构也开始设立汉学讲座,职业汉学家开始出现。1814 年法兰西学院聘请卢缪沙(Abel Remusat)为第一位讲座;英国伦敦东方研究院也于 1825 年开始教授中文;1855 年荷兰莱顿大学也设立汉学讲座,迄今仍是世界汉学重镇。各种学报期刊也开始展现研究成果,在这时期法国出版的《亚洲学报》(*Journal Asiatique*),莱顿大学出版的《通报》(*T'oung Pao*),百年来一直是很有分量的汉学研究期刊。最有成就,也是很具代表性的 19 世纪汉学家是英国的理雅各(James Legge),他在中国助手的合作下所译译的中国经典相当经得起时代的考验。总之,19 世纪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与研究,虽然由于后期新教传教士家庭及外交人员的常驻,而逐渐有较深入而正确的可能,但是其范围仍多限于语言、文字及翻译,汉学在西方一直是孤立于其他学术之外,从未认真地将中国的历史发展视为世界历史发展中息息相关的重要部分。

欧美汉学研究的第三个时期是 20 世纪。从 20 世纪起,许多学者以社会史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史,汉学研究的重心仍是在法国。1900 年法学者沙畹(Edouard Chavannes)在法兰西学院开始讲授中国历史,他是以批判法研究中国史之鼻祖,沙畹最有名的作品是《史记》的法译,及翻译西突厥史料与有关法显、玄奘的事迹。沙畹的大弟子葛兰言(Marcel Granet, 1884—1940)浸淫于社会学甚久,故能看到一般欧洲汉学家所未见的一些历史现象。1922 年,葛兰言以六周时间完成《中国的宗教》(*La religion des Chinoise*),由 Maurice Freedman 英译为 *The Relig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可以视为涂尔干(E. Durkheim)社会学在古代中国社会研究上的

应用。葛氏对中国古代宗教的研究特别注意家庭与仪式。20 世纪 30 年代德国的福兰阁 (Otto Franke) 以近代史学方法撰述的《中华历史》开始问世,而韦伯 (Max Weber) 更以比较历史的眼光,来探讨中国的宗教思想、官僚制度与经济发展的情况,为中国史之研究辟一新径,他的《中国的宗教》一书,对 20 世纪的西方汉学研究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

第四个时期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中国大陆的变局,以及美国强权的崛起,欧洲汉学转移到北美。北美汉学界以其充沛经费资助汉学研究的集体计划,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美国亚洲学会的中国思想研究委员会 (Committee on Chinese Thought,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在 1951 年至 1962 年之间,结合美国、中国及其他各国汉学家共同研究儒家思想,而陆续出版了一系列的论文集: (1) *Studies in Chinese Thought* (Chicago, 1953); (2) *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 (Chicago, 1957); (3) *Confucianism in Action* (Stanford, 1959); (4) *The Confucian Persuasion* (Stanford, 1960); (5) *Confucian Personalities* (Stanford, 1962)。这一系列的集体研究,与当时美国学术界盛行的社会科学研究观点颇有关系。(以上参考黄俊杰、古伟瀛:《西方汉学研究的发展》,《史学评论》,第 12 期,1~9 页,1981 年 9 月。)

也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哥伦比亚大学的狄培瑞开始提倡人文通识教育,陈先生翻译经典的工作,正好顺应当时时代的潮流。《中国哲学文献选编》这部书的出版,是陈先生与摩尔 (Charles Moore) 共同商议之下,介绍东方文化的整体工作的一环。正如陈先生在本书中文版的新序中所说的:

摩尔与予乃决定翻译东方思想全部,使读者可以观全。原定计划为一册。继以一册必在千页以上,难以印行。遂分印度、佛教、中国三本。印度部分由印度最著名学者 Sarve palli Radhakrishnan 与摩尔合编。1957 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部出版,命题 *A Source Book in Indian Philosophy*, 佛教部分一时未找得相当人物,卒之流产;中国部分则由予担当。

这部书可以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美汉学界的出版品中,选材最公允、论断最审慎的作品,自有其“不废江河万古流”的永恒价值。尽管不